



上海图书馆编

体坛回眸卷

LaoShangHai

FENGQINGLU



老上海风情录

(四)

体坛回眸卷

上海图书馆编

老上海风情录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王志伟

版面设计：蔡文彦

老上海风情录(四)

体坛回眸卷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 经 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图、文 236 面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646-023-3/I·242

定价: 74.00 元

编委名单

《老上海风情录》编委名单:

编委会主任: 王鹤鸣、马远良

编委会副主任: 陈燮君、王世伟、缪其浩、吴建中

编委: 祝均宙*、张伟*、冯金牛*、高洪兴*、陈莉、
马莉、王洪治、秦民华、张尚仪
(带*号者为常务编委)

编委: 崔媛萍、甘振虎、朱荣琴、陈颖、孙秀娣、
毛天虹、陈秀珍、徐群、胡新、秦飞、
王英仙、张建亮、江瀛子、刘澜、林娜

照片摄影: 王洪治

《体坛回眸卷》编委名单

执行主编: 祝均宙

副主编: 马莉

编委: 崔媛萍、胡新、甘振虎、王英仙、刘澜



录

从西风东渐到强国梦：上海近代体坛·····	祝均宙 1
西风东渐篇·····	14
“租界国”里特殊的体育圈·····	15
欧风美雨下的国人体育萌芽·····	46
富国强身篇·····	68
崛起自强的国人体育团体·····	69
融和竞争中壮大的国人体育·····	99
赛场聚焦篇·····	130
运动大赛的精彩定格·····	131
五光十色的赛场花絮·····	168
场馆风情篇·····	178
从公共设施到校园围墙·····	179
七彩纷呈的市民体育风情·····	205



上海近代体坛

从西风东渐到强国梦：上海近代体坛

祝均宙

当我们翻开中国近代历史这部沉甸甸的史书时，我们不难看到上海这个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坚船利炮所轰开的“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或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体现在租界统治领域的确定、城市区域的迅速扩大、商业经济的高度繁华、金融贸易的兴旺发达、五方杂处的人口群体等方面，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它一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那种向整个世界张开胸怀，吸收西方文明，吸取各国先进思想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开放度、公开度和辐射度。

体育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物化载体，同样也是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开始进入中国的。上海近代体育源头可上溯到十九世纪中叶。1845年11月，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胁迫清苏松太道宫慕久订立《上海土地章程》，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划定了东以黄浦江，南以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以李家庄（今北京东路），次年又议定西以界路（今河南中路）为限，总面积约830亩的英租界。此后，近代意义上的“体育活动”即在这块开各国列强在中国争租界之先的领域内开始。自这时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上海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一百零四年。一百余年来，它的发展是植根于整个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氛围的基础上，与其他领域诸如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一样，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与其他领域相比，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的运作上，它又具有自身的独特的发展轨迹。而且在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大环境下，它又具有国内其他近代城市体育无法与之相匹配的优势与示范度。

概览整个上海近代体育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海近代体育的萌芽阶段，时间大约从1845年至1910年。

其时正是整个中国社会从封建制王朝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过渡期。上海作为这个过渡期中的桥头堡，以鲜明特殊的政治格局，勃兴的经济市场，西学积聚的窗口形象，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个时期的上海体育还未进入中国普通市民的生



活中，它只是在沪西侨民生活圈中的一种“即兴”或“消遣”活动。作为具有西方文化内涵的“体育”一科，在这个时期仍然处于启蒙时期，但是它对上海近代体育发展却起着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其表现为三点：

一、西方体育开上海体育风气之先。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仅是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当中规模不算大、历史不称悠久的历史，它只是中国十八个省之一的江苏省属下的、由松江府管辖的一个三级县城。其体育活动仅仅局限在诸如武术、棋类、射击、划船等中国传统体育活动领域中。当1843年11月8日六个英国人首次抵达这个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后不久，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等先后接踵而至。据统计，至1910年，来上海定居的外侨人数达一万三千多名。涉及的国籍近三十个，除了上述几国之外，还有来自亚洲板块的印度人、菲律宾人、朝鲜人、马来西亚人，欧洲板块的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丹麦人、西班牙人、瑞士人、荷兰人、瑞典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挪威人，美洲板块的巴西人、墨西哥人，中东地区的伊朗人、埃及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及兼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人等。他们的职业涉及政界、工商界、学界、金融工业界、文化出版界、教育医学界等各个方面。当这些来自五洲四海的外国侨民到达这块远离自己故土的国度时，他们不仅在这块被他们称为“冒险家乐园”的黄土地上夺取了一份又一份特权，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国中之国”，同时又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文化生活带到了这块土地上。移民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和娱乐的多元化。而带有西方文化内涵的“近代体育”也就随着外国侨民一批又一批的拥入，自然地融入了他们居住和生活的这块土地上。

当时的侨民体育活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西方侨民的文体生活。这种文体生活起先是以租界社区为特征的，即以各国在上海划分的租界地域为限。如英国人以英租界为主，美国人以美租界为主，法国人以法租界为主。要开展一定规模的文体生活，首先就要建立一定的文体场地。因此，早在签定《上海土地章程》不久的第三年，即1848年，英国人就在自己的租界内开设了被自己侨民称之为“老公园”或“抛球场”（在今延安东路、河南中路口）的第一个跑马场。以后这个跑马场因租界的不断扩大，又先后于1854年与1862年两次迁地扩建，面积从最初的



81.5亩扩大到500亩。为适应外国侨民扩大文体生活的需要,英国人还将它租给各国西侨用于聚会和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各国总会先后在这里开辟过抛球场、滚球场、高尔夫球场、棒球场和足球场等,组织过侨民拔河、田径类的比赛。

第二、来自西方侨民的文体组织。移民文化还体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建立起来的、由外国侨民自己管理自己组织的各种俱乐部。据统计,这种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当时就达三十多个。其中既有综合性的俱乐部,也有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俱乐部。前者如英国总会、法国总会、德国总会、花旗总会、俄国总会等,后者如上海跑马总会、板球总会、越野总会、划船总会、游泳总会、上海足球总会(又称西联会)和上海万国象棋会等。这些俱乐部设有固定场址,除了举行租界内各国侨民日常的娱乐集会外,还常常定期组织侨民们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诸如1852年黄浦江上的首次划船比赛,1858年在浙江路跑马场举行的首场板球比赛,1892年在上海第一个游泳池——跑马厅游泳池进行的第一次游泳活动,1902年由西联会组织的第一届史考托杯足球比赛,1904年后每年由租界侨民举行的上海万国竞走赛等等,均属此类。

第三、来自侨民主办的各类学校。有人说:“教育近代化是社会近代化的起点和标尺之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和西方侨民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上海创办的不少教会学校,从1847至1900年,有史记载的就有16所。1847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怀恩小学,1848年由法国天主教士晃德莅创办的徐汇公学,185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创办的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传教士琼司女士创立的文纪女塾,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特蒂神父创立的圣芳济书院,1881年美国监理会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1881年美国圣公会卜黄素娥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1892年美国卫理会海淑德创办的中西女塾,中国耶稣会士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等等。这些西式化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除了少数侨民子女外,主要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教学活动中,不仅传授了大量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同时也给予受教育者实施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于是音乐、美术、外语、体育、戏剧等这些全新的课程开始进入中国教育领域。这些学生在接受上述系统性西学课程后,也就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观和理论观念扩散于家庭,辐射至社会。近代在





从学校围墙走向社会体育竞技的过程中，尤以上海圣约翰大学最为著名。该大学原名圣约翰书院，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翰（S.J.Schere Shewsky）将该会创办的原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创办。1887年担任校长的卜方济（F.L.Hawks Pott）在1906年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名在美国注册。该校对上海近代体育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最先在上海教会学校中开展各类近代体育活动。其涉及的体育项目几乎囊括所有现代体育项目，如田径、足球、篮球、乒乓球、体操、网球、棒球、游泳等。二是率先将体育竞技的观念和比赛带给了中国人。它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举行的以田径为主的运动竞赛会，乃是中国体育史上最早出现的近代体育运动会。1902年，该校和南洋公学发起组织足球赛，开创了上海体育史上校际足球年度体育比赛的先河。早在十九世纪末，该校曾留学欧美的学生唐露园、颜惠庆、牛惠生等人，将自行车带进校园，成为传播自行车车技的首批华人。

当上述三种源体融为一种既有数量又有力度的社会活动后，这种社会活动便对生活在周边地区的上海人产生了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给予只从事传统体育活动的上海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和洗礼，并给上海市民带来一种全新的文体信息，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据当时报刊记载，清末民初每逢四方侨民举办公开运动会时，观者如潮，市民们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来自异国的“奇特举止”，从惊诧——接受——模仿——自立，逐步完成了从排斥到调和、吸纳西方近代体育的全过程。

二、近代体育中的“革命思想”与实践。

如果说在近代，西方侨民在开展体育的过程中，并未像政治、宗教、文化、教育那样，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化的实施目标，那么在十九世纪末期，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人士却在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时，都已自觉地将开展体育运动作为实现各自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在思想上，他们接受清末进步思想家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政治观点，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1896年，康有为编辑过《日本书目志》，该书在“教育”类目下，列有日本人毛利仙太郎与神保涛次郎合著的《体育学》一书。这是迄今所见的含有近代体育概念的“体育”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追溯其源，该词乃是日本维新时期借中国汉字译造的西方语。康有为在他著名的《大同书》中，就曾详细论述了小学、中学

乃至大学开展体育教育的种种设想，认为德智体中“体育亦特重焉”。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也曾在他写的名著《原强》中，不仅强调在人的一生教育中，以“澹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之纲”，而且，他将人的体魄强健上升到关系“一国富强之效”的高度加以认识。梁启超在他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更是将“尚武”强国的精神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这些体育主张以后被以孙中山、蔡元培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在“驱逐鞑虏，复兴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下，更是提出了“尚武强身”、“强种保国”、“强民自卫”等各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体育主张。在行动上，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始，他们最先将具有军事组织性质且具有强壮体魄的西方“体操”，引入了中国；并将“体操”锻炼与培训近代军事工业人才、革命党人武装起义骨干紧密地联合起来。在上海，体操最先是在西方传教士主办的几所早期教会学校中盛行。这些学校将体操作为一种加强学生纪律、强壮学生体质的课程，它主要分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两种。普通体操又分徒手、器械两种，前者侧重队列训练，后者借助一些运动器械，如哑铃、棍棒、单双杠、球竿、跳台等。到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这种体操已扩展到击剑、刺棍、拳击、哑铃、足球、竞走、跳远、单双杠、游泳、跳高等项目众多而更为广泛的体育范围。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一所专业体操学校乃是松江体操练习所，建于1905年，创办人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何东。而影响最大、办学时间最长是1907年建在上海北浙江路华兴坊的中国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主要创始人徐一冰，早年留学于有强烈革命氛围的日本大森体操学校。他以“提倡正当体育，发挥全国尚武精神，养成完全体操教师，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身体力行地实现其“体育救国”、“教育救国”的政治思想。该校的教学内容，其范围包括伦理学、教育学、体育学、生理学、急救法、教授法、音乐、国文等。专业课程包括瑞典体操、普通体操、哑铃、球竿、棍棒、木环、应用操、游技、兵式教练、射击术、拳术、武器等。该校历时20年，共培养了36届学生，计1531人。在1911年，由该校全体师生组成的学生军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推翻清朝政府的火热行动中，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它所培养的毕业生，成为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先驱和中流砥柱。如上海东亚体校创办人傅球、庞醒跃，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创办人陆礼华，广东体专创办人杨振



老上海风情录

峰，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创办人华豪吾，苏州中山体专创办人朱重明等。

上海国人体育也就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声呐喊和组织下，融入了时代的内容，赋予了新的使命。在“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主”的革命口号下，近代体育与中国近代革命联为一体，在宣传革命思想、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近代革命史写下了一页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同时，也为二三十年代上海近代体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上海近代体育的繁盛阶段，时间从1910年至1937年。

这一时期正是上海城市发展取得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在政治上，它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一·二八抗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洗礼。在经济上，它已从一个无名的沿海小镇迅速发展成远东最大的工商业都市、贸易金融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在文化上，因其文化事业的多样性、文化发展的导向性、文化鉴赏的权威性、文化联系的广泛性，而成为全国文化精英荟萃、名著名剧迭出的文化中心。在人口群体上，它又因其特有的宽容大度，海纳百川，使这个城市的移民人数占全市人口的85%，人数竟从二十世纪初期的一百万人猛增到三百余万人。那些来自国内的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湖北人、福建人、山东人等共处一街，那些来自国外的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越南人、印度人、日本人等同住一城，致使各种经济活动异常活跃，各种文化兼容并蓄。这一切为上海体育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使上海体育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场面。它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西方的体育观念和方法已逐渐被多数市民所认同。它基本体现在接纳——共处——竞争这三个发展过程中。所谓接纳，是指这个时期的西方体育运动项目，已不单纯只是萌芽状态时期西方人生活圈中的一种文体活动和少数教会学校及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涉足活动的领域，而已从特定的圈子走向社会，走向平民百姓的生活。市民们已不再用惊异的目光注视这些来自西方的体育项目，而是身体力行地直接参与到这些运动中去。所谓共处，也就是这个时期的体育运动，已脱离了早期华人与西方侨民各自单独开展的形式，而在同一个体育场或同一个运动场上，和平共处进行比赛。所



谓竞争,也就是华人在同西方侨民组织比赛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这种意识来自一种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思想,尤其是在有重大影响的体育比赛中,或是在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就显得更为浓烈和高涨。在这接纳——共处——竞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过四个回合的交锋:洋务运动时,西式军操的引入,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交锋;戊戌变法时,西方体育理论的引入,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交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西方体育的实施与复古派之间的交锋;二十年代,西方竞技体育与传统体育的论争。斗争的结果,都使中国的传统体育与西方的竞技体育取长补短,互为融合,促进和发展了中国的体育运动。在这方面,尤以上海精武体育会为典范。

第二个方面,体育的物化形式实现多元化的态势。这个时期,有助于体育发展的各种事物不断涌现,诸如体育专业教育的完善,体育运动竞赛体制的形成,体育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体育法规的制定,各类综合专业体育组织的创立,各种体育书籍报刊的发行,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都促进了这一时期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多元化、立体化的体育形式又以三种生动活泼的具体化手段和形象体现出来。

一是新式体育学校的建立。1919年和1922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两度发表《改革学校体育案》和《学校系统改革命令》,原称的“体操”改为“体育”。据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在上海开办的新式专业竞技体育学校就有15所,其中较重要的有1915年8月成立的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1916年成立的上海爱国女子体育训练班,1918年成立于宝山县的成烈体育专门学校,1918年8月成立的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19年成立的东南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21年成立的私立上海体育师范学校,1922年成立的上海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1924年成立的私立上海沪江女子体育学校,1927年成立的华东体育专科学校,1930年成立的上海中国体育学校,1932年创立的江南体育师范学校,1936年10月成立的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和陆礼华创办的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同时,在上海还有一些开展体育活动较广泛的学校,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中西女中、爱国女校、民立中学、徐汇公学等也纷纷开设体育课。这些专业和综合学校的授课方式和内容已不限于早期“体操”一项,而是扩大至田径、球类、竞技游戏、拳击等方面,校际之间不仅常常举行各类比赛,而



且还将学校的优秀运动员派出参加社会上的各类竞技比赛，争取名次，以促进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

二是民间各类体育管理组织的崛起。在萌芽时期的上海体坛，由国人组织的体育管理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业运动组织，一种是专业或业余的体育运动团队。前者于辛亥革命前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的仅是1906年由上海士绅李平书、朱少屏、袁公诚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体操会。辛亥革命后，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各类体育管理组织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较重要的就有1914年成立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和上海自行车会，1916年成立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前身是1910年成立的上海精武体操会），1918年3月成立的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1925年成立的上海网球联合会，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和中华足球联合会，1922年成立的上海中华网球联合会，1926年成立的中华棒球联合会，1927年成立的上海中学体育联合会，1929年成立的中国游泳会，1931年成立的东华足球队。后者有白虹运动队、三育体育会、新华球队、水星体育会、白队篮球队、霞光乒乓球队、骷髅健身团、黑白女子篮球队、华东足球队、乐华篮球队、蓝白田径队、黑白女子篮球队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中华体育协进会。该协会简称“体育协进会”，它是该时期最重要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其他体育团体也对促进各类单项体育运动的繁荣兴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是各类体育场馆的兴建。体育场馆既是体育赖以生存的必备物质条件，又是人类进行交际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数量多寡优劣往往是一个地区体育兴旺发达的晴雨表。萌芽时期的体育场馆可说是西方侨民的一统天下。按粗略统计，自1848年英国人开设第一个跑马场至1919年，这期间西方侨民在上海开设的重要运动场地就达二十余个，其中较著名的有：1862年建于南京西路上的跑马厅，1892年建立的跑马厅游泳池，1907年在北四川路建立的公共游泳池，1909年建立在虹口公园内的高尔夫球场、足球场，1909年建立的上海青年会健身房等。但由国人建立的体育场却只有一个，即1909年由巨商叶贻铨等人集资在江湾建造的上海第二跑马场（后改称万国体育场）。辛亥革命后，这种局面得到扭转，一些由国人集资、民间捐赞、政府出资兴建的体育场馆，随着体育运动和竞赛活动的增加而不断出现。1917年3月30日西门公开体育场正式建成（1928年改称为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今沪南体育馆）。1925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天文台路（今合

肥路)又建成了中华运动场。1926年张啸林、范四春在江湾引翔港建成了远东公共体育场(又称上海第三跑马厅),1930年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又落成中央运动场(回力球场)。1932年7月高桥海滨游泳场开幕。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建设计划中,又兴建了包括三个田径场、体育场、游泳馆在内的大型上海市体育场(今江湾体育场)。这些体育场馆的兴建对刚从萌芽状态苏醒过来的近代体育无疑是一种催化,为二三十年代上海体坛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错位的体育领导权开始转化。上海近代体育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尽管在体育教育、体育项目内容、体育竞赛规模、体育社团数量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中国体坛存在一个极为怪异的现象,即笼罩着“体育殖民”的怪圈。这种“体育殖民”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近代体坛上体育领导权的错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几乎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所有国内外重大赛事,均由外国人主掌,如被认为标志中国近代体育之始,于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运会(原名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乃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埃克斯纳;1914年全国第二届全运会的主持者乃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A.H.Hougland);即使1924年在武昌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虽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但仍然有一些项目的裁判权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至于分别在1915年、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远东运动会的领导特权,更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192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会上竟然发生了由侨居上海的美国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格雷(J.H.Cray)作为中国代表登台演说,由此引起国人运动员、华侨的愤慨,一时舆论哗然,群情沸腾,并由此再次引发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产生的收回体育主权的强烈呼声。1924年趁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之时,各界有志人士共同倡议成立全国体育组织。同年8月,乘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会议之际通过章程。该协会由15名董事组成,总部设在上海申报馆中,后移至中华运动场,推举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当名誉主席董事,沈嗣良当名誉主任干事。该协会的成立,从此结束了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局面,标志着中国人自行管理体育竞赛的开始。它在审编国人各项运动规则、审订各项运动记录、解决运动赛事难题、选拔参加各种国内外重大赛事的运动员,及参加各项世界体育单项联合会的事务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





作用。1931年它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接纳为会员。协会成立后，在它的管辖下又先后成立了中华足球联合会、上海篮球联合会、上海网球联合会、上海棒球联合会、上海裁判会，租地建造了中华运动场，并将1927年8月举办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四个方面，竞技体育运动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具有激烈对抗性质的近代竞技体育运动会最初产生在上海几所早期的教会大学中。如早在191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就举办过田径运动会。被体育史学家们追认的191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实际也是一个学校运动会，其名称就是“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上海在全国及世界地位的升级和影响不断扩大，这种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体育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时，此起彼伏。在竞技比赛形式上，既有单项竞技，又有综合竞技；既有专业竞技，又有业余竞技；既有多国多边竞技，又有国际双边竞技；既有侨民与侨民之间的竞技，又有国人与侨民之间的竞技。在竞技运动会规模上，既有社会各行业自组的，又有专业运动队的；既有全市性的综合运动会，又有全国乃至亚洲地区运动会。在竞技项目内容上，据统计，就有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垒球、橄榄球、棒球、羽毛球、门球、台球、保龄球、航空模型、射击、拳击、游泳、跳水、赛艇、举重、摔跤、柔道、武术、体操、击剑、自行车、摩托车、赛马、马术等等。与此同时，二三十年代上海竞技体育运动还呈现着两大鲜明特点：一是大型体育赛事不断。许多重大的国内外竞技赛事选择在上海举行，如1935年和1948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六届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始于1908年—1937年的上海万国足球赛，1927—1937年间召开的上海万国足球锦标赛，第一届到第十七届（1904—1911，1923—1931）的上海万国竞走和上海万国马拉松赛跑，1926—1937年第一至第六届上海国际运动会。二是竞技体育转向市场。许多工商企业利用体育效应，纷纷加入各种以企业名称命名的奖杯竞赛。如1926年至1930年，以上海通商银行命名的“通商杯”就举行过七届。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各类竞技体育运动的比赛，使上海的各项运动成绩名居全国之首，巩固了体育兴旺的地位。如第五届全运会17个锦标赛中上海队获得9个锦标，所设的39项田径项中上海获得14项；在第六届全运会17个锦标中上海获7项，16个田径项中上海队获得15项。竞技体育的兴盛，不仅使上海体坛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而且使上海体育在全国影响更加扩大，并引得一批国内外著名运动员纷纷定居

上海，如黄伯长、邱飞海、林宝华、李惠堂、符保卢等。由此各项体育运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向全国的体育运动辐射，带动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在二三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

第五个方面，传统体育始与西方体育融合渗透。早期的体育项目是相对西方近代体育项目而言，这里既有属于中国体育国粹的武术、气功、赛龙舟等，也有与西方体育相类似的射击、摔跤、游泳、举石担、溜冰等。处于萌芽时期的这些传统体育项目主要在华人圈中作为强身健体的一种活动，并未掺杂西方竞技体育中的那种竞争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中国传统体育的观念和训练方式受到了挑战和冲击。一些武术界的强才高手开始醒悟并借鉴西方体育的观念和手段来改造传统体育。他们甩掉武林中帮派林立、以强欺弱、助纣为虐的恶习，还远离了辛亥革命“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尚武”风气，而将“武术”的“实用价值”转到重在身心锻炼、道德修养、审美要求的轨道上。1919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又将具有西方体育观念的《中华新武术》列入全国学校的课程表里。1923年4月在上海市西门公共体育场开幕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期间，还进行了类似西方的学术研讨会。自1919年至1937年，上海地区成立的主要武术团体就多达45个，其中最著名的是1910年创办的上海精武体育会。该会前身是1909年在闸北建立的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即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武术家霍元甲。霍死后，陈公哲发起建立该会。陈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是一个具有开明意识的武术家。他在引入西方体育观念和西方体育训练方法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武术的精华。他并不将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对立起来，而是以武术实践为主，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创建精武会的过程中，将“提倡武术，研究教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作为该会的主旨。他还在该会下专设游艺部，游艺部下设的体育项目，如网球、铁球、铁饼、篮球、木马、标枪、乒乓，实际上就是西方体育项目。为了弘扬他的事业，他自1919年起开始走出上海，在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建立起四十余所精武分会，会员高达四十余万人。该会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民间体育组织，而且成为近代史上融合中西体育精神的领头羊。该会的活动多次受到孙中山先生赞扬，他不仅数次亲临运动场予以嘉奖，而且特地给该会题了“尚武精神”四个字。中西体育的融合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削弱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反而大大发展和扩充了传统体育的内涵与外延。据上海体育志统计，在上海地区发现的武术拳种竟高达





76种101招式，这只是该时期上海体育蓬勃发展的一个例证罢了。

第三个阶段：上海体坛的消沉阶段，时间从1938—1949年5月。

这个阶段是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日战争和为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而进行解放战争的阶段。从总的趋势审视，上海体育在这两大战争阶段基本处于消沉衰落的状态。尽管抗战后上海体育一度出现恢复的迹象，但它难以重振三十年代的雄风。由于内外条件的变化，该阶段的体育主要表现出三大特点：

一、从鼎盛兴旺走向消沉衰落的两大转折：一是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的全面开始，一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前者导致了国人举行的各项竞技体育赛事的全面萎缩，后者使原先在租界活跃一时的西方侨民的体育活动，随着英美侨民的大量回国而停止。这两个事件造成的直接后果，一方面使体育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日益恶化，如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大企业大量西迁，通货膨胀日渐高涨，百姓生活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它使体育内在的物质条件荡然无存，中小型专业体育机构被迫解散，一些全国性的体育组织要么内迁，如中华体育协进会，要么遭受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如上海精武会。体育界的许多爱国同胞纷纷走向抗日前线，或失业在家。许多体育场馆遭到炮火的袭击，而毁于一旦，影响最大的是由国民党政府建立的上海大体育场。事实是：在1937年8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期间，上海再也没有举行过一场影响较大的体育比赛。

二、民众自发的“救济体育”与昙花一现的“日侨体育”。1937年11月12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西方侨民生活的上海租界地区以外的所有周边区域，上海这个城市进入了被人称为“孤岛”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长达四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止。由于当时日本还未和英美法等国宣战，因此租界成为当时唯一还有些体育赛事的一块“绿洲”。一些进步的文化体育界人士和工商业者，就利用这块“绿洲”开展了以救济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为目的、带有慈善性质的体育赛事，他们将“抗日爱国”与“赈济救难”融为一体，以鼓励“孤岛市民”的抗日意识。这些体育比赛尤以场地小经费省的网球、乒乓球、健美最为活跃。据当时《申报》、《新闻报》等报刊记载，仅自1940年至1941年间，以这类名义举办的乒乓赛就达五十余个，参赛的队伍多达六十个以上。这些比赛往往有企业赞助，授以企业命名的奖杯，如国标杯、钱兑杯、精武杯、华联杯、大陆杯、花旗杯、钱业杯、丝友杯、